



段炼 著

“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

五四启蒙思想中的
新道德观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
五四启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观研究

段炼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五四启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观研究/段炼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2662-6

I. ①世… II. ①段… III. ①道德观念-研究-中国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3869 号



“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

——五四启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观研究

段炼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87,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662-6/K·2303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世俗时代”的开启:超越世界及其瓦解	29
第一节 天:儒家的德性之源	31
第二节 “仁”与“礼”的道德图景	41
第三节 从“天理”到“公理”:“世俗化”的开端	47
一、德性的退隐:从“理与势”到“体与用”	49
二、德性的旁落:来自“天演公理”的挑战	55
三、德性的沉沦:“力即理也”	61
第四节 “个人”崛起:规范伦理的解体	70
第二章 五四时期的道德转型	81
第一节 “自作主宰”的人生:个人主义的兴起	83
第二节 当“功利”取代“善”:德性伦理的解纽	103
第三节 呼唤“穆姑娘”:迷乱之现代人心	116
第三章 个人德性的重建	130
第一节 五四的功利主义:“精神的”超越“物质的”	131
一、快乐的“质”与“量”:两种“功利主义”	132
二、德性目标:人生境界的追求	136
三、道德实践:探询“内在价值”	142

第二节	五四的个人主义:从“小我”到“大我”	150
一、“群”的嬗变:“无中生有造社会”	151	
二、人生价值:在“小我”与“大我”之间	158	
三、“不朽”:从“真我”到“真社会”	165	
第四章	公共伦理的证成	176
第一节	“公德”、“私德”与共同体	178
第二节	从个人德性到公共伦理:“三纲”的抽象继承 ...	186
第三节	追寻德性:在“政治共同体”背后	199
结语	这个世界会好吗:“世俗时代”的道德反思	220
参考文献	229
后 记	246

导 论

一、问题的缘起

1895年至1920年初,是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转型时代”^①。其中,五四时期又是转型时代的高潮。从思想内容的变化上看,转型时代是一个超越价值世界瓦解的“世俗化”的时代^②。随着晚清以来“公理”世界观对“天理”世界观的冲击,构成思想文化核心的基本宇宙观和价值观发生动摇,并由此导致这一时代的道德价值取向发生了失落与迷乱。继晚清以来儒家规范伦理(三纲五常)解体之后,到了五四时期,原本具有超越内涵的儒家德性伦理(仁学宇宙观)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较之晚清有了更加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现世的“快乐”与“功利”的主张,取代了传统儒家伦理中“善”的超越地位。另一方面,强调意志自主的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也得到极大发展。随着个人从传统中获得解放,自由意志逐步恢复活力。人们相信,依据多元的自由个性和价值选择,每个人都在“功利”与“快乐”的引领下,对自己的人生“自作主宰”。可以看到,在现代中国世俗化的过程中,道德价值观念的正当性不再来自于超越世界,而是由人

①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② 所谓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指人们的价值、信念和制度规范的正当性,不再来自超越世界,而是人们依据自由的意志和理性自我立法、自我决断,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命运,设计理想的未来。许纪霖:《世俗化与超越世界的解体》以及相关主题笔谈,载许纪霖主编:《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们自我决断，人成为了道德价值的立法者。

世俗化意味着道德背后超越世界的解体，五四的道德观念建立在了个人的幸福与快乐的世俗层面。然而，在一个道德祛魅的世俗时代里，人生价值与生活意义还有追寻的必要吗？现代社会是否需要共同德性和超越精神来维系和延续？在一个缺乏公共德性和文化认同的社会里，价值的普遍性可以仅仅依靠程序公正实现自我证成吗？知识分子关于意义问题的思考，不仅贯穿于儒家道德超越价值逐渐瓦解的近代中国，而且在中古以来基督教文化衰落的西方世界，同样具有一定的普遍性^①。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是具有“内在深度”、可以自作主宰的个体。每个人都拥有满足功利与快乐的权利，每一种生活都来源于对于人生意义的自我理解。然而，当个人疏离了德性、社会无视公共的价值认同，共同体果真如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所言，仅仅依靠一套具备政治正义的秩序就能实现价值证成吗？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等社群主义者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当人们置身一个缺乏超越精神的现代社会，个人除开失去了更大的社会和宇宙视野之外，还失去更高的目标感，终日沉溺于寻找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②。人们因为热衷于私人生活的满足，从而失去了更为宽阔的道德和情感的视野。无疑，目标感的丧失与人生狭隘化相连，缺乏德性规约的个体，往往表现为一种“无公德的个人”^③。以自我为中心的唯我主义

① 西方社会的世俗化历程以及现代价值观的形成，见[英]布林顿(Crane Brinton)：《西方近代思想史》第四章“第十八世纪：新宇宙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美]理查德·塔纳斯(Richard Tarnas)：《西方思想史》第五篇《现代世界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这一思想进程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道德价值观的影响，见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 Inc.，1987)。

② [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③ 关于“无公德的个人”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及其后果，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的盛行,使得人们的生活中缺少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也导致了对更大的、自我之外的问题和事务的封闭和冷漠,其后果是个人生活的狭隘化和平庸化:一方面,个人成为物欲横流的时代里疯狂逐利的个体,因此,他们的集合也只能形成在物质私欲面前俯首听命的庸俗大众。另一方面,随着德性和超越价值从公共领域的退却,个人热衷于—己私利,对他人和社会事务漠不关心。即使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的个体,也不再愿意从公共文化的共同价值出发,将参与公共事务作为人生重要的意义所在。人们乐于封闭在私人领域中享受生活,而不愿主动地担负起对于公共领域的责任。因此,对德性的漠视必然导致个体政治自由的丧失。这一消极行为的灾难性后果便是,个体必须独自去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而这正是孵化威权主义的理想温床。

无疑,世俗时代里的意义探询,是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复杂议题,也是每一个现代人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当然,本书无意在规范层面,全面回应这一因世俗化带来的意义难题,而是试图将这一思考,引入清末民初中国转型时代的思想史脉络之中,对五四时期启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观加以研究^①。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以《新青年》和《新潮》为核心的启蒙知识分子阵营,既在五四时期开道德变革的风气之先,也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对人生观和德性问题,有着细致思考和广泛实践,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具有典范意

^① 宽泛地看,“道德”(morality)与“伦理”(ethics)常常被视为同义词或近义词,两者在原始语义上都与品格(character)、习惯(habit)相关,也都以“善”为追求目标。本文在对道德问题作概论性叙述时,通常对两者不加区分。同时,就两者的差异而言,一般来说,道德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与超越价值相连的、追求“善”的理想;伦理则大体表现为道德的行为规则尺度。[英]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伦理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4页。就本书涉及较多的儒家道德而言,其中的“仁”,指的是人的内在之善涵养与发展的最高层次,属于儒家道德体系中“德性伦理”的部分;而其中的“礼”,包含着在“善”的指导下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属于儒家道德体系中“规范伦理”的部分。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对于“仁”与“礼”及其关系进行了初步阐释。

义。另一方面,就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社会而言,儒学具有“以道德代宗教”和“以伦理组织社会”的泛文化整合功能^①。然而,随着清末民初普世王权的瓦解和意义世界的衰微,五四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宇宙观和人生意义的危机。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之下,他们将怎样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规范,更新儒家道德的精神超越资源,进而重塑人生和世界的意义秩序,无疑是转型时代心灵秩序重建的重大问题。

因此,本书立足于近代中国世俗化转型的历史背景,通过对五四时期新道德观的研究,试图回应如下具体问题:当功利与快乐成为这一时期新道德观的基础,五四的启蒙思想是否提供了现代道德的价值标准?新道德观背后价值超越性的失去,又是否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道德相对主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新教改革以来的西方现代社会,通过分离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以应对世俗时代的价值多元化挑战,那么,在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新道德观当中,德性与伦理之间又形成了怎样一种关系?在五四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通过对近代中国思想史脉络的“重新问题化”和对五四新道德观的自我理解,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世俗时代的价值命题,为多元现代性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

二、研究综述

关于五四启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观及其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论述^②。特别是近30年来,国内外思想学术界对于这一历久弥新的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

^② 1979年,台湾学者周阳山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文章中即已指出:“六十年以来,有关五四的篇章,在字数上恐怕早已过千万大关。”周阳山:《五四与中国——论有关五四的研究趋向》,转引自萧延中、朱艺编:《启蒙的价值与局限——台港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话题,有了更加多元而深入的理解与阐释。这些研究,有的从文化思想或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对于五四道德观念进行宏观阐释;有的从参与者本人的回忆或活动入手,描绘出转型时代中国社会变动不居的道德状况;有的一方面检讨五四时期道德革命与道德重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相互消长,一方面在新旧道德的冲突之间,探索推进中国历史演进的力量与途径。而新一代的思想史研究者,则试图将转型时代道德观念的失序与重建等问题,与诸如“世俗化与超越价值”、“个人价值与公共认同”、“政治正当性”等一系列更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和文化的议题联系起来,将其“重新问题化”。在新的问题意识的引领之下,研究者力图开启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脉络和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以期更加深刻地反思五四时期的道德观念^①。

1. 20世纪70到80年代:关注“个人觉醒”与“反传统”的道德启蒙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以来,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开始,学术界对于五四时期道德观念的研究,大体上在“弘扬民主与科学”、“反传统”、反“封建(专制)主义”等颇具现实关怀的理论主题之下展开,描绘出一幅五四时期新道德与旧道德交锋的历史图景。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周扬(1908—1989)在报告中把五四运动视为20世纪“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一,并高度评价说“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来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他说,陈

^① 限于篇幅,“研究综述”部分只能选取近30年来,在五四时期道德观念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著述,大致以时间为序,梳理其中学术理念演变的脉络,并简要评述其学术价值。此前的重要研究成果,如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常乃惠著《中国思想小史》等,将在正文相关章节以脚注形式出现。

独秀(1879—1942)主编的《青年杂志》“从内容来说,也只能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孔学和维系封建社会的旧礼教三纲五常、旧道德忠孝节义的尖锐批评,不能不使人为之震动”^①。周扬对于五四时期的道德观念的理解,也成为了“文革”结束后主流意识形态和学术界阐释这一话题的基调。

在这一时期的论著中,彭明将五四运动比作冲破“中世纪黑暗局面”的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向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国粹、旧文学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做出了很大贡献”^②。侯外庐(1903—1987)在同时期的文章中也持相似的看法,他说:“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就是揭橥民主与科学,批判与它不兼容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在他看来,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最大特点,就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全面的空前猛烈的批判”^③。王正萍、蒋国田在《五四运动与思想解放》,金冲及、胡绳武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徐宗勉、朱成甲在《论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思想革命》,蔡尚思(1905—2008)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实践意义》,刘启林、陈瑛在《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道德——回顾五四时期道德领域上的一场斗争》,张岱年(1909—2004)、楼宇烈在《五四时期批判封建旧道德的历史意义》,孙思白、韩凌轩在《“五四”以来反封建文化运动之史的考察》等论著中,大多将论述的焦点集中在新旧道德的冲突之上。他们对于五四时期道德变革的判断与理解大

① 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② 彭明:《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同上书,第198页;彭明著:《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99年修订再版)。

③ 侯外庐:《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思潮》,同上书,第321、326页。

体趋同,即在五四之前,“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即“共和制度的存废,决定于人们的思想觉悟。只有人们普遍有了民主的觉悟,才能实现民主政治”^①。因此,他们把“开展批判和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斗争,唤起人们的觉醒看作是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所以五四是“以反对封建文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②。

黎澍(1912—1988)在《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中,则以相当多的篇幅谈到五四的道德革命中崛起的现代“个人”。他认为“五四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使得“长期匍匐在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们第一次有了作为人的自我觉醒,认识到了自己是独立的人,有做人的权利”——虽然在作者那里,这种“自我觉醒”仍被视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发的”^③结果。金冲及、胡绳武在文章里,也特别强调五四的知识分子用来反对封建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也是“资产阶级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的学说”,“他们激烈地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的奴隶道德,着眼点也在于它妨碍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④。孙思白、韩凌轩的文章强调五四的道德革命,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决裂的精神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⑤。胡绳(1918—2000)则敏锐地注意到五四和戊戌维新在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上的思想关联。他指出,五四掀起的道德革命之所以较之戊戌维新的变革更加彻底,其根源就

① 徐宗勉、朱成甲:《论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第449页。

② 王正萍、蒋国田:《五四运动和思想解放》,同上书,第364—365页。

③ 黎澍:《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同上书,第274页。

④ 金冲及、胡绳武:《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同上书,第413页。

⑤ 孙思白、韩凌轩:《“五四”以来反封建文化运动之史的考察》,同上书,第525—526页。

在于五四的知识分子已经大胆质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孔子之道’，即封建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是否还应当保存”。他特别强调进化理论在形成五四道德观念中的巨大理论助推力，也精确地指出五四的知识分子试图“以思想的力量为新的社会和国家奠定基础”。在这篇题为《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一文中，胡绳明确地指出“个人主义”是五四新信仰、新思想的核心。而打破“纲常名教”的封建枷锁，争取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独立自主权利，就在于“一切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要顺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①。

深受“文革”结束后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对于五四道德观念的研究，本身包含着研究者强烈的道德激情与历史反思意识。当时的学术界已经较为普遍地注意到五四时期新旧道德冲突的历史情境。围绕着以《新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对于新道德的相关论述，研究者对于一度讳莫如深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五四道德观念中的新内涵，初步给予了历史性的评价与肯定。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尚未超越“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单向度解释模式。在学术理念和理论话语上，对于五四时期道德观念的研究，也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简单化约和政治图解的倾向。

2. 20世纪80到90年代：发掘“态度同一性”背后的道德“两歧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开放与交流的不断深入，随着“文化热”在80年代思想学术界的弥漫，理论教条与意识形态的束缚得到极大的摆脱，五四时期道德观念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如果说，前一时期的研究者依靠“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资

^① 胡绳：《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第299、304—307、311页。

产阶级的不彻底性”等理念,构筑出一幅五四道德观念的基本图景,那么,到了这一时期,研究者开始逐步深入道德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层面,意识到“必须正视五四意蕴的复杂性,多层面地探讨五四的实质,如此,才可能发现五四当代图像及其世界性意义”^①。对于“态度同一性”背后道德观念多元化及其内在张力的分析,对于现代价值与传统理念之间复杂关联的阐释,成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之后一段时间中五四道德观念研究的深度所在。

无疑,海外研究者早期或同期相关论著的引入,极大地拓展了这一时期大陆学者五四研究的新思维,也有力地推进了五四研究学术范式的转型。周策纵(1916—2007)在写于 1960 年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的第 12 章中,巨细靡遗地分析了新思想对传统的重估,非常明确地谈到新思想中现实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成分以及新方法中实用论、怀疑论的因素,还包括它们在打破中国传统伦理和思想中的重大意义。在该书的结语部分,作者敏锐地觉察到,五四时期新道德观中强调的个人解放,“与西方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与西方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意义也不尽相同”。“五四时期对于个人和独立判断的价值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但同时也强调了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②。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则将论述的焦点聚集在五四带来的道德观念变革与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探求之上。在该书第二章“新知识分子的出现:世代合作与论争”以及第三章“五四‘启蒙运动’”中,作者注意到,世界观的改变对于五四道德观形成

① 余英时等:《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也非启蒙运动 “五四”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9 年版,前言。

②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00—433、492 页。

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启蒙先驱毕生献身于那些超越独特传统文化的崇高理想。这些先行者致力于改造国家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承认此种超越性理想的迫切性。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他们坚持进行艰辛而又必要的价值观革命。当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时，他们却坚持追求新的世界观(world view)”^①。在道德观念上，对于五四的知识分子而言，改造自身与改造世界相结合是他们最鲜明的精神特征。

作为80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之一，《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收录了部分美国学者研究五四的早期成果。在《〈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中，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以宏阔的视野，沟通了“传统”价值与“现代”理念之间的看似遥不可及的鸿沟。他指出，与那种“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的截然两分的看法相反，五四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思潮和西方思潮之间寻找各种类似性和相融性。“他们在某种超文化界限的关系中看待问题和论证的倾向”^②。而在对章炳麟、王国维和学衡派的深度关切中，夏洛特·弗斯(Charlotte Furth)分享了与史华慈一致的观点^③。实际上，这些看法也渗透到了由史华慈本人撰写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8章“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以后”的部分内容之中^④。而当时国内学术界将五四视为一种“个人主义运动、彻底反传统文化运动”的看法，则在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对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社会”观的强调中得到平

① 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② [美]本杰明·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以及《论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载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以及第149—163页。

③ [美]夏洛特·弗斯：《五四与近代思想文化》，同上书，第90—100页。

④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6—504页。

衡。德利克注意到,在五四知识分子的道德世界之中,“社会的改革必须超越个性解放的范畴,而扩展到社会和经济平等的问题,以及社会和政治进程中的大众参与问题”^①。

林毓生在这一时期的论著中,特别指出五四时期的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全面而整体”的反抗^②。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他通过对陈独秀、胡适(1891—1962)、鲁迅(1881—1936)三个个案的研究,试图表明五四之所以要求打倒整个传统文化,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未能从儒家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有机式一元论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③。林毓生的这些看法,照亮了过往五四思想史研究的许多暗角,也在当时思想文化阵地上引发了持久的纷纭聚讼^④。不过,他通过普世王权的崩溃引发

① [美]阿里夫·德利克:《五四运动中的意识与组织:五四思想史新探》,载《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第61—62页。

② 这一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本杰明·史华慈与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J. Meisner,一译迈斯纳)的支持。两人均认为,1911年以来令人绝望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所导致的愤怒情绪,对于启蒙思想家全盘性的反对传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使得他们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是“中国在近代世界上处于困境的根源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障碍”。[美]本杰明·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载《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第7页,以及[美]莫里斯·梅斯纳:《对五四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反传统主义的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

③ 林毓生:《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兼论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载氏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以及《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当时学界受“文化热”影响,对林毓生这一看法的反思,多从五四知识分子从事的是“自我批判”而非否定民族传统的角度立论,如耿云志:《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载《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1—117页,以及张天行:《五四启蒙思想家的化约倾向与突破》,载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359页。

的政治秩序瓦解和心灵秩序破灭,反思传统文化和道德架构的解体,无疑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道德观念转型的本质特征。林毓生还着力研究了五四时期道德观念中的“个人主义”。在他看来,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功利主义或者是个人主义,更是一种心灵的渴求——一种个人从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冲动。不过,林毓生也承认,这种“个人主义”最终并没有形成他所认为的“把个人本身当作目的”的个人价值信仰。从这一点上看,所谓“全盘反传统”与“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模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和谐。实际上,五四的知识分子仍在儒家主张的“修齐治平”的框架下重建五四的新道德,对于“公德”与“私德”有着彼此沟通的看法。这一思路仍应视为“有机的一元论模式”下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道德)问题”的做法。所以,林毓生关于“全盘反传统”的说法,或许只在关于五四某些特定的历史叙述当中起作用。

张灏则开创性地将 1895—1920 年初前后 25 年时间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转型”意味着一连串危机的爆发,而对于道德观念而言,最根本的转型就是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在晚清的解体和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在五四的解纽。“就整个转型时代而言,儒家德性伦理的核心思想的基本模式的影响尚在,但这模式的实质内容已经模糊而淡化。因为前者,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仍在追求一个完美的社会与人格;因为后者,他们的思想常呈现不同的色彩而缺乏定向”^①。他关于转型时代道德伦理瓦解的深刻概括,为进一步研究五四时期道德观念奠定了理论的基调^②。张灏对于五四思想史研究所作的另一关键性贡献,在于他精

①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② 陈方正则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对于价值取向危机给予了清晰中肯的描述。陈方正:《五四独特的吗?——试论近代中国与欧洲思想转型的比较》,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36页。